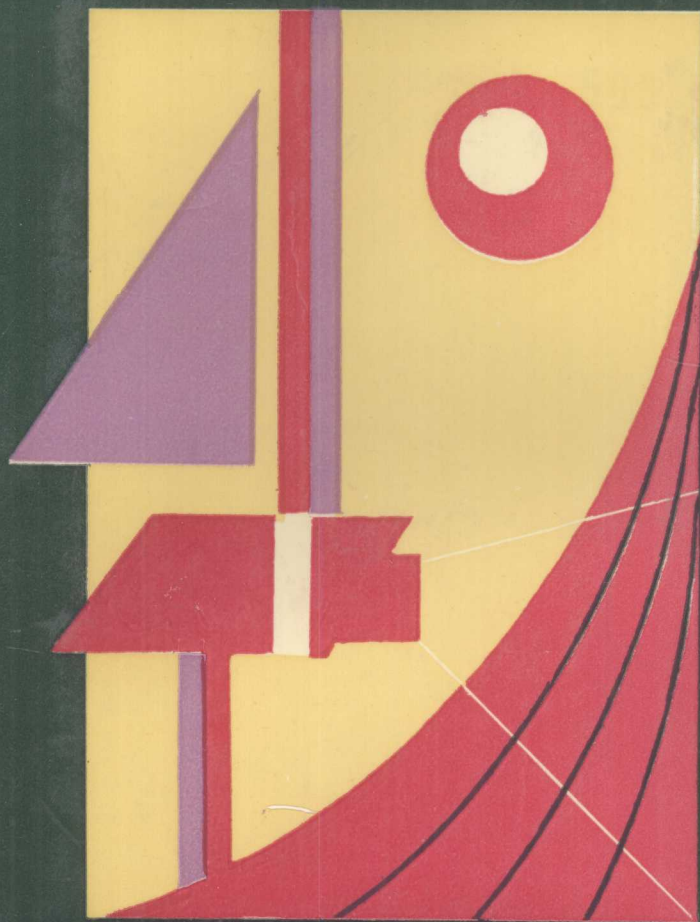


山东文艺出版社



张弓弩剧作选

Zhang Gongnu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孤弓弩剧作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 3 号

张 弓 弩 剧 作 选

张 弓 弩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375 印张 2 插页 479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7—5329—0822—4

I·741定价 11.00 元

一个文艺战士的足迹

(代序)

这篇文章在标题中之所以称文艺战士，因为战争年代的文艺工作者，从生活到工作，都要服从战争、为战争服务。不仅要和战士一起参加战斗，还要自觉地“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870页）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经过多年学习与实践，逐渐明确的。

我的家乡黄县，文化比较发达。在农村，喜欢京剧、秧歌、唱大鼓的人，为数众多。每到农闲或夏夜，一些京剧爱好者，便在街头巷尾，敲起锣鼓，招徕群众，或成韵、或选场、或选段地唱起来。每年正月，唱“大戏”、跑秧歌、遍及各村，热闹非凡，可惜内容都是旧的，宣传封建迷信的东西居多。

我第一次参加演新戏是一九三二年，那时我才十一岁。在小学老师张辑民的倡导下，编演了以十九路军蔡廷锴在上海抗击日军侵略为内容的文明戏。戏台是用木板搭在小学院内的操场上。演出时，全镇（那时我们的村名叫窪镇）老少，除病重者外，几乎都赶去看戏。当演到日寇残杀上海军民时，台下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十九路军英勇将士和敌人肉搏，用大刀砍杀敌军时，观众呼声雷动，欢欣若狂。当时，由于我年幼无知，

对群众反映为何这般强烈，为何与看旧内容京剧的反映截然不同，只觉得奇怪，根本说不出个子午卯酉。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胶东的新戏剧活动蓬勃兴起。除抗战剧团、国防剧团等许多专业文艺团体外，部队、农村、学校各种业余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一九三九年春，我在八路军五支队新兵营任政治委员时，就组织了战士业余演出队。因没有女角，便和后方留守处俱乐部的姜明（女）同志、仲敏（女）同志一起，编演了揭露日寇对中国人民奸淫烧杀为内容的戏。我饰老头，仲敏同志饰老头的儿媳妇。因剧中有日寇想强奸她的情节，仲敏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演这个角色。实在没办法，只好由女同志姜明饰演鬼子，仲敏同志才同意参加演出。公演时，因没有化装油彩，我们便用锅底灰、妇女搽的胭脂掺着化装；老头的胡子没法解决（那时我十八岁），只好用膏药把一块狗皮粘在嘴上。当演鬼子的姜明同志用日语污言，妄行不规时，我便上前阻拦。按规定动作，她应打我一记耳光，不料她一掌下去，把我嘴上粘的狗皮打掉，我心想，这一下给把戏演砸了！出我意料，观众不仅没笑、没叫倒好，反而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当演到八路军冲来，把鬼子杀死时，全场沸腾，大喊大叫，情绪之激昂，难以言表。使我体会到，这次艺术水平不高的演出之所以受群众欢迎，主要是表现了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和消灭敌人的愿望，主要是因为它的内容。

我认识到戏剧对动员、教育群众的巨大作用后，对戏剧工作便更加热爱。一九四〇年春，我找到和我同一天参军的黄县老乡、当时任国防剧团乐队指挥的袁先同志（后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文艺部副主任、《风雨下钟山》导演），请他设法把我调到国防剧团工作。不久，袁先同志告诉我，当他向团长虞棘同志（后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提出时，虞棘同志说：“剧团是连的单位，张波（我那时的名子）是营政委，调来不好安排。”

我当即表示，只要叫我搞戏，怎么安排都行。不多天，我便被调到国防剧团，担任分队长，兼作演员、编剧、导演工作。

说到编剧，当时的国防剧团有一个很好的作风：它演出的节目，虽然也演些外单位的好作品，但主要靠组织本团人员，自己动手编写。每逢需要剧本和其他文娱材料时，便把能写或愿意学习写作的同志召集在一间屋里，点上汽灯（当时根据地少有的“现代化”照明灯具），或一人独写，或二、三人合作，打个通宵，便写出一批作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除剧团自己排演外，有时编成《文娱材料》，或在军内外报纸上发表，或油印成专辑，供农村、部队、学校业余剧团演出。有时候，因战斗频繁，连“打通宵”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几个编导委员凑在一起，七嘴八舌临时现凑，即兴演出。记得有一次部队与日寇、伪军、国民党投降派从上午接上火，一直打到下午太阳靠山，我胜敌败已成定局的时候，接到通知，要剧团当天晚饭后组织晚会，为部队庆功。我们几个被派到部队参战的同志马上赶回剧团，临时凑了个提纲，给全体演职员一说戏，就演出。演出时，因几个编导委员都担任主要角色，只好趁下场时间，轮流“把场”。主要任务是根据贴在上场门旁的提纲，给上场的演员提示需要表演的内容，和组织指挥演员上下场。这种即兴演出，虽然有时艺术质量不高，有些粗造，但因多是“就地取材”，演的是战士自己的生活与战斗，贴近战士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追求，台上台下，喜怒哀乐，水乳交融，演出效果，反倒很好。

当时采用的文艺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只要群众喜闻乐见，如话剧、歌剧、小调剧、大众剧（话剧加京剧唱段）、活报剧、秧歌剧、大鼓、唱歌、跳舞、拉洋片、变戏法、耍猴戏（国防剧团养了两只猴子）、说快书、莲花落……等等，无所不用。略加改造，赋以新的内容，都可收到较好的演出效果。

上面说过，胶东的群众是比较喜欢京剧的。在以虞棘同志为首的编导委员会的倡导下，我们试用了话剧加京剧唱段的形式，很受群众欢迎，故名子曰“大众剧”。那时，国防剧团的多数同志既不会，更没演过京剧，为了宣传群众，便多方搜罗京剧人才，这期间先后招收了杨大成、栾少山等同志。一些不会京剧的演员，也自觉地逼着自己上“架”。记得有一天，宣传干事兼国防剧团指导员包敏同志通知我们说，第二天要组织晚会，欢迎兄弟军区的清河大队。因为我们多数同志刚从部队返团，没有剧目可演，包敏同志说他回去加夜班，赶写个“大众剧”。第二天中午，还不见包敏的影子，大家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直等到太阳快平西了（那时国防剧团的同志都没有表，只好看太阳或听号声过日子），他才把夜以继日突击写出的剧本送来。大家一看，连连叫苦。不仅字写得潦草，难以辨认，而且有的角色对话、唱段很多。特别是饰演主角的我，更是叫苦不迭，不仅台词、唱词多，短短两三个小时难以背过，有的唱腔还得现学。记得我饰演的是一个贪婪成性、卖国求荣的地主。在诸多唱段中有八句“流水”，词难记，腔难学，仓促上阵，实在怵头。演出时，记不得的词只好现编现唱。当唱那八句“流水”时，唱了两句，就把后面的六句全忘了，只好边编边唱。因“流水”唱腔太快，根本没有思考时间，唱不完八句，又不会收腔，越急越慌，待把八句唱完，连自己都不知道唱的是什么词。出我意料的是，当戏演完，观众却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天，日军反战同盟的小林清同志找到我，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赞许地对我说：“你的，八路里大大的坏人！”

那时的演出，并不都是“急就章”。在“青纱帐”（指高杆农作物）起来的时候，敌人偷袭、扫荡的可能性大大减少，部队便抓住这一两个月的有利时机，进行休整。这时的剧团，便收拢人员，精心创作，排演一些大型剧本，如《第五纵队》、

《李秀成之死》，虞棘同志写的《投降派的没落》、我写的《除夕之夜》等。

那时，因敌强我弱、战斗频繁，部队经常处于游击状态，几乎每天夜里都要行军，每夜多则百里左右，至少也要走四、五十里。稍不注意，就会遭到敌人的偷袭或合围。在行军途中，和敌人打遭遇战的事，时有发生。记得有一次部队行进在洪沟的小山上，被鬼子打了埋伏，国防剧团仅有的几块幕布、两盏汽灯和一点自制的化妆品，连同驮这些什物的骡子全都丢了。幸好被十三团的战士给夺了回来。当我们表示感谢时，战士们说：“拼上命也要把它夺回来，不然，就捞不到看你们的戏了。”

每逢敌人大型“扫荡”的时候，国防剧团所有成员除病号和女同志疏散到老百姓家中或敌占区的“堡垒户”外，男同志全都分头到连队，一面教战士唱歌，给战士说快书，活跃部队文娱生活；一面和战士冲锋陷阵，与敌人拼搏。如一九四〇年“六一”大“扫荡”时，我和刘栋同志到了十三团。刘栋在一营二连，我在二营五连。在老草沟的山头上，和大队日、伪军交火。刘栋同志随二连冲下山头，和敌人短兵相接，因他只有一枝二号橐子，没有长枪，在部队和敌人拼刺刀时，刘栋同志被敌兵刺死，壮烈牺牲。我所在的五连负责牵制敌人，在和敌人交火中，我的狗牌橐子根本打不到敌人，敌人的步枪、机枪、掷弹筒向我们密集射击，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况，实在令人憋气。在交火中，我们的黄副连长中弹身亡，战局对我方十分不利，当部队奉命撤出战斗转移时，敌人追击甚急，枪弹纷飞，钢炮轰鸣，我和一个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拼死把黄副连长的遗体背了出来。

国防剧团在历次战斗或反“扫荡”中牺牲的同志除刘栋同志，还有曲华、吴凝、刘笑梅、彭云、姜宝、包敏、张成功、

王魁、岳天仁、胡天、尉明、刘景铎、徐志欣诸位同志。他们（她）们这种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正因为我们是文艺工作者又是真正的战士，经常和群众、战士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所以，对群众、对战士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理想追求，个性特点，都比较熟悉，在写和演他们的时候，就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这样的作品和演出，自然会受到他们的喜爱和赞赏。

正因为经常和群众、战士一起生活、劳动和战斗，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革命人生观的奠定，起了极大极好的作用。由于认识到戏剧是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使我们对戏剧从一般的喜爱，升华到爱戏如迷、甘愿为它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

一九四二年十月，国防剧团组织晚会欢迎许世友同志重回胶东军区任司令员（一九四一年许司令曾带清河军区的一个团到胶东指挥过六个月的反投降战役——又名两山大会战）。演出的剧本是虞棘同志写的《汉奸了缘》，由我主演了缘和尚。当时我正患伤寒病，体温持续在四十一度左右，医生、领导怕有生命危险，都劝我不要演出。我出于对许司令的尊敬和对战士、对戏剧的热爱，坚意上演。每次下场，由于高烧，冷得浑身发抖，全团同志的十几件棉大衣都“垛”在我的身上。临到上场，我把大衣一掀，抖擞精神，继续上演。待到全剧演完，刚刚迈进下场门，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同志们急忙找老百姓用担架连夜把我送进医院。昏迷了十多天，病了半年多，差点送了性命。

一九四二年春，我病愈出院。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商定，调马少波、江风和我转业地方、充实胶东文协的机构。马少波同志任编辑部长，江风同志任研究部副部长，我搞戏剧工作。先

到胶东公学开展两个月学生戏剧活动，接着负责组建平（京）剧团。

在胶东公学的两个月，除了给爱好戏剧的同学讲戏剧常识外，还给他们排了两个我写的剧本：一是《金线道》，揭露敌人利用封建道会门欺骗群众；一是《一支手枪》（刊登在《胶东青年》上），写的是以抗战为背景的爱情故事。这个戏，由我导演并饰男主角），江新蓉（现为中国京剧一团名演员）饰女主角，胶公的艺术老师王艺叟饰伪公安局长。演出中，在台下看戏的鲁特同志（他那时是胶公的学生）被感动得大声痛哭起来，两位同学怕影响大家看戏，把他撵了回去。在演出后的座谈会上，东海中学语文教师刘立凯同志说：“学生们很喜欢这个剧本，希望张波同志以后多为他们写戏。”

组建胶东文协平（京）剧团，颇费了一些周折。一是没“戏箱”，二是没演员。买“戏箱”不仅没钱，而且因敌人封锁，根本没处可买，只得向有“戏箱”的村子借，或通过敌工关系从敌占区搞，或通过战斗从敌人手中缴获。没有演员，只好访问、收拢旧戏班的流散人员。抗战爆发前文登县有个旧戏班主叫周宝善，抗战爆发后，他所领导的戏班，因兵荒马乱，难以演戏，职演员只好各奔东西，自谋生路。有的回家种田，有的捕鱼捞虾，有的当了道士，有的沿门乞讨。把这些人收拢建团以后，从他们过去演出的剧目中挑选出一批内容较好者，如《失、空、斩》、《王佐断臂》、《挑滑车》、《打渔杀家》、《蝴蝶杯》、《贺后骂殿》、《宇宙锋》、《起解》、《捉放曹》、《八大锤》等，略加改动，即演出。效果尚好。以后，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逐步加强思想和业务建设。那时，演员数量少，演戏必须“赶角”。主要演员放不下架子，不肯演配角，更不肯“跑龙套”。我便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教育、影响他们。只要演出需要，那怕“现买现卖”，力争做

到缺什么，补什么。打手锣、“跑龙套”、演丁郎、饰县官，无所不干。这样一来，主角们也都争先恐后地干了起来，只要能赶上“场”，角不分大小，有时一赶二，甚至一赶三，做到了人少也能演大戏。并及时加强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戏剧观。使大家认识到，演戏是为了教育人民同仇敌忾，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为了赚钱，供阔佬们消愁解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演旧戏不行，还必须演新编的以爱国主义、阶级教育为内容的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连续排演了我写的《牙山举义》（又名牙山英雄由华东书店胶东分店出版单行本）、《新三娘教子》（载《胶东戏剧》），高洁同志写的《仲秋节》、《将相和》等，都收到了较好的演出效果。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胶东后，我们认真地进行了学习。通过学习，使我茅塞顿开，大彻大悟，把过去在戏剧工作中取得的朴素经验，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文艺应为人民大众（包括工、农、兵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解、熟悉、描写自己的服务对象，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忠实代言人，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活情趣、理想追求；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凶恶残暴，嗜杀成性。从而唤起人们的觉醒，团结奋斗，消灭敌人，共建伟业。

由于认识的提高，对以后的工作则更加自觉，效果较前也更为显著。

一九四四年，胶东戏剧研究会成立，我被选为副主任委员。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烟台解放，我被调任烟台文协副主任兼燎原剧团团长。刚解放的烟台，情况十分复杂，日、伪军

的破坏搜刮，国民党特务的蛊惑倒乱，再加上我们当时的领导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市民和学生的思想均极混乱。逃亡青岛（那时为美军与国民党军队占领）者时有发生，开展工作，很是困难。但由于我们以毛主席的《讲话》为指针，较好地执行了党的文艺政策与知识分子政策，燎原剧团从业余发展为专业，团结了一大批知识青年。主要成员有陶毅、高玉铭、兰玉瑛（现名兰瑛）、王仁、徐静、陈岩、曹航晶、王厚蓉、王厚堂、张昇明、张涛、刘俊岱、韩秀丽、张国瑞、王文忠、曲祥云、杨梦苓、王怀琴等。一九四六年，星火剧团并入燎原。我仍兼任团长，栾澄同志任副团长。燎原剧团从成立到撤出烟台，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不只演出了我根据矛盾的小说《蚀》改编的同名话剧（据兰瑛同志记忆，这个戏是她在学联剧团时我给她导演的），而且还上演了诸如《白毛女》、《血泪仇》、《群猴》、《山城故事》、《毛主席万岁》等名剧。我写的剧本《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一九四六年胶东文艺评奖获戏剧奖。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攻占烟台，燎原剧团和爱好戏剧的青年学生五十多人，随我们一起撤到解放区，合并到胶东文协文工团。包干夫同志任团长，我任政治教导员兼戏剧教员，张冲云任副团长，张显任副教导员，陈志昂任音乐教员，臧家伦任政治干事。合并之前，文协文工团上演的剧目，大都是外地或兄弟剧团的作品。演自己写的东西很少。合并之后，我很想改变这种局面，恰巧胶东在“土改”运动中，发现了一桩轰动而感人的故事——贫下中农在挖地主的“浮财”时，从地主婆的地窖中，找到了“失踪”多年的雇农。马少波同志据此创作了短篇小说《农公泊》。在少波同志赞同下，由我执笔，与马少波、包干夫、陈志昂合作，并由陈志昂作曲，写了二十七场同名大型歌舞剧（由华东书店胶东分店出版单行本）。

那时，工作条件很差。酷夏的晚上打通宵，实在是件苦

事，不仅没有夜餐可吃，连防蚊设备都没有。在小而昏暗的豆油灯下，写起戏来，对叮咬腿脚的蚊子都顾不得扑打。被咬得实在熬不过去，只好用儿子的尿布把腿脚包起来。有一天半夜，当我写到第二十四场栓子嫂、五婶、三嫂发现地主婆室内有一地窖，要下去探穴而又怕鬼、狐怪罪时，我顿觉身临其境，毛骨悚然，只得把正在酣睡的爱人叫醒，让她坐在我的身边，陪我写到天亮。

当我把初稿写成后，召集文工团全体同志座谈，到会的同志对剧本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论：多数同志认为写得很感人，可以立起来看看，在排戏和演出中进一步加工修改，使它更臻完善；个别同志则认为《农公泊》的题材与《白毛女》属同一类型，而《白毛女》写的是地主黄世仁欺凌老父（杨白劳）、弱女（喜儿），很容易唤起观众的同情，《农公泊》写的是年轻雇工被地主婆霸占，是一种失掉阶级立场的变节行为，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作为执笔者的我，当然赞成多数人的意见，并提出由我执导，立起来看看再说。马少波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支持我的意见。会后，他不仅看了剧本，而且还亲自动手，写了第二十场中的“打进进士第”一段歌词。

戏剧效果完全出乎持否定意见同志的意料，当我在排演第十二场栓子嫂（年轻雇工的妻子）被迫出走时，在场围观的群众，被感动得放声痛哭。其中一位农民边哭边说：“地主和狗腿子太歹毒了！太歹毒了！实在叫人不忍看下去！”他抱起孩子，哭着离开了排演场。

《农公泊》当时的演出阵容是相当整齐的，主要演员有：兰瑛（后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饰九尾狐，江新蓉（中国京剧团名演员）、韩秀丽（空政话剧团名演员）、徐静（北京《学习与研究》编辑）三人轮流演栓子嫂，曲云（八一电影制片厂名演员）饰大妈，高玉铭（山东省文化厅顾问、山东剧协主席）

饰小诸葛，初敏（广州空政话剧团团长、名演员）饰小皂王，鲁杰（空政话剧团艺术指导）饰九头蛇，陶毅（天津《天外天》副编审）饰四叔，纪先饰栓子，王仁（空政话剧团名演员）饰刘喜子，陈岩饰娟子，袁霞（八一电影制片厂名演员）饰二嫂，刘瑰玲（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饰三嫂，宋萍饰二妈，牟春高饰老七，我任导演兼饰胡松山，陈志昂（中央电视台台长助理）乐队指挥。演出几十场，观众反映极为强烈。该剧后被著名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移植为评剧并主演，易名“九尾狐”。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奉命调回部队，接替虞棘同志任胶东军区文工团（国防剧团）团长。一九五一年调任胶东军区文化科长。一九五二年考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三年后，改做理论教学和部队政治工作，写戏成了“副业”。一九五五年我写的评剧《擦亮眼睛》在《剧本》月刊发表后，北京、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市人民出版社，分别出了单行本，并被收入《山东十年剧作选》，有的省还出了“小人书”。除中国评剧院小白玉霜主演过，还被移植为豫剧、晋剧、秦腔、河北梆子等几十个剧种，很多名演员和几百个剧团上演过。一九五六至五八年我写的《落网》、《滚出台湾去》由山东出版社分别出了单行本。

白居易《罢郡》一诗吟道：“自此光阴归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我离休之后，便全心身地投入写戏。几年来，共写了十一个本子（内有九个是与儿子张少飞合作编剧），其中，《激战序曲》（戏曲）、《迴狂澜》（六场话剧）分别由山东、河南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迴狂澜》并获山东省第三届剧本评奖剧本奖。《财礼恨》（与张少飞合编）获山东省第四届剧本评奖特别奖。《爱的铭牌》（与张少飞合编）由山东省电视台拍成电视剧。十集电视连续剧《贞观皇帝与长孙皇

后（与张少飞合编）由《影视文学》一九九〇年第五、六期，一九九一年第五期连载。

我是中国戏剧家协会成员、山东戏剧家协会特邀顾问、齐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顾问，原济南市警备区顾问，曾任山东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三十余年，为了集中精力写戏，上书告退。

五十多年来，我先后发表过几十本作品，可惜在战火和文化大革命中遗失殆尽，实为憾事！这次选入的三个“死里逃生”的剧本，为了保持它本来的“历史面貌”，我没再作修改。到一九六二年，我从事戏剧工作整整六十年了。我愿把这个集子，作为献给为戏剧事业而牺牲的战友墓前的一束小白花。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尽管我已年逾古稀，仍将作为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奋笔力耕，把有生之年，奉献给戏剧事业，直写到心脏停止跳动之时。

本文原载《戏剧丛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补正。

目 录

一个文艺战士的足迹 (代序)	(1)
✓牙山英雄 (京剧·又名《牙山举义》)	
附:《牙山英雄》说明	(1)
✓擦亮眼睛 (评剧)	(47)
✓九尾狐 (评剧·原名《农公泊》歌舞剧)	(97)
附:马少波《多演现代戏》	
✓纣王与妲己 (连台本戏)	(187)
✓财礼恨 (戏曲)	(261)
✓迴狂澜 (话剧)	(308)
附:徐向前元帅审阅初稿后对作者的重 要指示	
✓爱的铭碑 (电视剧)	(405)
✓贞观皇帝与长孙皇后 (电视连续剧)	(461)
✓神奸巨蠹 (电影文学剧本)	(613)
去艺术学院讲戏剧工作传统之后 (代跋)	(667)

牙山英雄（又名牙山举义）

第一场

人物——宋宝

四青袍

民众甲、乙、丙。

（四龙套引宋宝上）

宋 宝：（引子）十年寒窗官七品，

俺乃满清忠臣！

（诗）自古家贫出孝子，

国乱方显忠良才。

作官不论大和小，

步步高升列三台。

（白）本县姓宋字白仁，栖霞人氏；在我不得志的时节，人多叫我宋宝贝。自从满清进关我就报名投效，也是我的官星太显，三蹬两爬可就坐上了这栖霞正堂啦。可是这几年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连年歉收，老百姓没有饭吃。前日书吏对我言讲，老民穷困，捐税缴纳不上。我为了效忠清庭，讨得上台欢心，又报了一个丰年，管他老民贫困不贫困，挨饿不挨饿，事不关己，可就管不了这许多了！